



当代青年遭遇都市

——青春文学与城市书写的一个现象考察

金 理

一、“宅女”和“吃货”的面具

这一天“京漂”的“我”，行走在楼群的峡谷间和立交桥下，对着丛林一般的建筑群，对着“五十二层高的京广大厦和有三百米高、八十八层的望京大厦”，幻想着“用手指轻轻一弹，那些高楼大厦就会沿着马路像多米诺骨牌一样依次倒下去”（邱华栋《沙盘城市》，一九九四年）……

这一天，倪可们爬到作为上海象征之一的和平饭店顶楼“我们知道一条翻过女厕所的矮窗，再从防火楼梯爬上去的秘密通道”，“在这积满历史尘埃的顶楼上”，“在饭店老年爵士乐队奏出的若有若无的一丝靡靡之音里”，开始宽衣解带（卫慧《上海宝贝》，一九九九年）……

这些年轻人，不满于都市生活的压抑，表达出对抗与征服，尽管或许出于幻想，或许还谈不上“征服”，但无疑有一种冒犯、撒野的兴头。“这一天”的这个时刻，借用特里林的描述，从属于“十九世纪小说发展历程的伟大传统”^①：青年遭遇都市。在这样一脉文学传统中，我们可以看到巴尔扎克、司汤达、亨利·詹姆斯、德莱塞、福克纳……这些大师笔

下的青年人大多具备如下性格特质与生命状态：当庞大的都市在面前展开时，他们内心充满野心与狂想，身上迸发出“一股兴冲冲的劲儿”，欲与未知的世界角力。尽管这场角力以及背后不断膨胀的欲望往往会在某个时刻功败垂成，但是他们之所以来到城市，正源于在欲望的鼓励下追寻一个“可能的自我”。

可是，这样一种“张牙舞爪”、不驯服的姿态，连同那股粗犷的、“兴冲冲的劲儿”，以及焦虑对峙中焕发出来的“辉煌能量”，正在渐次消逝。青年主体在对现实的反应中自主性明显弱化，两者的关系处于相互整合之中；到了新世纪的今天，明显反映出这一“整合”过程完成、连摩擦痕迹都不复存在的，是青春文学中的两类青年形象。

一类是郭敬明式的小说中“拒绝成长”的“孩子”。无须让生命悸动的痛感来提醒自己，也无须在黑暗的长旅中左冲右突，铺天盖地的广告、传媒早已告诉了那个“孩子”成人世界的秘密与真相。郭敬明笔下这个“只想呆在自己世界里的孩子”，以持守纯真的

^①（美）莱昂内尔·特里林《卡萨玛西玛公主》，《知性乃道德职责》，第150-152页，严志军、张沫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1。

自恋姿态来暗享“豁免权”(当“抄袭”事件闹到法庭并被炒得沸沸扬扬的时候,记者问及郭敬明是否在意,郭的解释是:“我不想参与到成人世界的争斗中,我只想呆在自己的世界里。”);同时又在早已熟稔成人社会游戏规则的前提下,将成长过程“压缩”,一出场就“定型”。从表面上看,这个“孩子”的形象刻意呈现出一种“中性”(去意识形态化、去精英化)化的生活姿态,这种姿态很容易俘获大批读者,似乎在都市生活中游刃有余。但是伴随着摩擦、焦灼一起消逝的,还有任何对抗性实践的可能性;大量自我封闭、拒绝成长的形象背后,恰恰受制于消费主义的意识形态,是对市场社会主流价值的全面认同,从而不断再生产着既存体制下的权力关系。

当代青年遭遇都市,他们在今天文学中的另一类形象,是平抑了欲望,甚至消解了绝望后,外表淡漠、心如死水的人。他们不同于郭敬明笔下的人物,因为物质条件优渥,似乎实现了充分的选择可能,于是对什么事情都提不起劲。他们之所以外表淡漠、心如死水,其实有着更深刻的根源。孤身“漂”到城市,“方圆几公里都找不到一个励志故事”(韩寒语),如果“睁了眼看”,无奈、无力甚至绝望感可能每天都会侵扰你。不是“不想”,而是知道“想了也没用”,转而寻觅自慰、化解的渠道。

前段时间我读到一位朋友的小说,从人物塑造、叙事技巧和小说完成度而言,没有任何问题。我略为不满的是小说主人公所指向的生活态度,那种面对社会压迫机制的保守性——基本欲望在社会环境的高压下磨砺而成的、屈从的生存之道。小说写的是一个“宅女”的故事,失业后待业在家,“不爱出门不爱动”,“在家待的时间越长,她对外界的兴趣就越小”,逐渐变得“无欲无求”……当代青年遭遇都市,在日益膨胀的社会消费面前,被鼓荡起强烈的欲望,却由于社会地位的

渺小与无助,摒弃在利益集团之外,也无力与坚固的社会结构正面抗衡,由此产生无奈与积怨,这原该是种复杂的情绪。但是在“宅女”的故事里,我更多看到的是上述情绪被顺利地转化、稳妥地解决。而问题正在这里,似乎一种自我劝慰的逻辑正在掌控青年人的言行:“我”和“我”的欲望投射物之间鸿沟过于巨大,算了,不要有“非分之想”,……想也不要想了吧。

小说中的“宅女”又恰恰是个“吃货”,请注意:“宅女”和“吃货”正是当下都市青年中最流行的两张面具。关于“吃货”之于个人的意味,诗人王小妮曾与她的学生做过探讨:“也许‘吃’是唯一能最快最直接带给他们存在感的方式。‘吃货’及时地帮助他们补上了‘存在’这个空缺,也得以超越感官本能,上升到了某种精神寄托的层面”,“除了好吃的真的美味”,现在的年轻人“愈发觉得什么都不可靠”,“只有吃到肚里的东西才可靠”。“吃货”暗示着这代人无奈而又清醒的认知——“一个是要多强大有多强大的社会,另一个是渺小的孤零零的自己,碰到抗不过的强大阻力后,他自然退却,直接退回靠饱胀感去知会的这个自身”^①。

越是困难重重的生活,消解、转化焦虑的途径也越多。吊丝的自嘲、自晒“囧”、“糗”的段子,已然成为“衰人”(loser)、弱势群体的自我表达,借此将愤怒、失望、沮丧与无奈转化,同时也消弭了自身诉求反抗的可能性。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宅女”和“吃货”的流行,暗示着“无欲无求”、拒绝参与社会、拒绝公共世界的趣味,这也是一种虚幻而犬儒的化解危机之道。日本学者千野拓政教授在一次访谈中提及:日本政府近四十年来每年进行舆论调查(类似我们这里的“你幸福

^① 王小妮《上课记2》,第4、6、154页,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2013。

吗?”)，在二〇一〇年以二十一至二十九岁年轻人对象的调查中，当被问到“是否对现在的生活感到满足”时，有65.9%的男性、75.2%的女性回答“满意现在的生活”。这一代年轻人被称为“达观世代”，出生于一九八〇年代，他们“不开车，不想要名牌衣服、不做运动、不喝酒、对恋爱也很冷淡”，“社会的闭塞感不断增强，即使抱有梦想和目标，能否实现也无法确定”，由于“在事前就会早早预测自己的行动会带来什么结果”，于是“没有过高的期待和要求”^①……日本社会学家这样分析此现象：“对将来还留下可能性的人，或者对以后的人生还持有‘希望’的人回答‘现在我不幸福’，不算否定自己……反过来说，当感到自己不会更幸福的时候，人只好回答‘现在我幸福’。”这位社会学家的研究报告题为《绝望国家的幸福青年》^②。只有那些觉得社会结构已经闭合，万难改变的青年人，才会认命，终于心平气和，选择“幸福感”；相反，那些还有能力去想象一个更加理想、更加美好的生活世界的人，依然觉得改变当下是有可能性的人，才会焦灼、感到不满。在中国也一样，大多数人选择了前者。巴赫金说：“强烈感觉到可能存在完全另一种生活和世界观，绝不同于现今实有的生活和世界观（并清晰而敏锐地意识到）——这是小说塑造现今生活形象的一个前提。”^③正因为我们已经弃绝了“完全另一种生活和世界观”的想象力，所以今天的都市社会上、青年文学中才会流行“宅女”和“吃货”的面具。

二、高加林的“分身”及其不同际遇

有两类人会非常满意“宅女”和“吃货”所暗示的那种青年人自我劝慰——放弃“不切实际”的“非分之想”，自己“想通”——的逻辑。一是每年毕业季的时候粉墨登场的各

类专家，他们谆谆劝告高校毕业生们“不要待在一线大都市里”；二是房地产商，比如任志强就有一句名言——“富人才有资格购买商品房，而中低收入群体靠经适房或廉租房来解决”。社会学家孙立平曾引述过马拉松式与金字塔式社会结构的差异：人们在金字塔中虽然占有不同的社会/空间位置，但始终处于同一结构之中，而马拉松的游戏规则是不断地使人掉队，“被甩到了社会结构之外”，在这个意义上，参与游戏的与被淘汰的处于结构性的“断裂”之中^④。专家和房地产商们一致在说服那些没有能力加入马拉松比赛或者在比赛中奄奄一息的人们接受这个“合理”的现实。可是这个现实真的“合理”吗？“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偏偏“人之道”却背道而驰。今天的社会里，在上者通吃一切，青年人却被自我抑制得“无欲无求”，纷纷躲进“宅女”和“吃货”的面具。

要追问的是，为什么在这样的时刻，青年一代对欲望的自我治理会显得意味深长。黄平曾经将路遥的《人生》视作中国城市文学的“一个很有意味的起点”^⑤。这个判断颇有见地，值得继续加以探讨。

回顾历史，在集体化时期，每个人的生涯都受到制度性规范的限制，几乎没有选择空间，成分好坏决定政治前途，出生地限定了个人是城镇居民还是农村居民（这显然和一系列差异巨大的福利相关联），即使在日常生活中，穿戴、交友、婚恋等都有一套意识形态

① (日)古田真梨子：《达观世代没有欲望的年轻人》，《新鲜日本》第113期 (<http://share.snacktools.com/AA899D7EFB5/fh56krr4>)。

② (日)千野拓政、吴岚：《文学的“疗救”、纯文学、轻小说》，《中国图书评论》2013年第7期。

③ (前苏联)巴赫金《关于福楼拜》，《巴赫金全集》(第四卷)，第98页，晓河等译，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

④ 孙立平：《我们在开始面对一个断裂的社会》，《战略与管理》2002年第2期。

⑤ 黄平：《一个上海，各自表述》，《民治·新城市文学》2014年第2期。

的潜在指导标准。伴随着改革启动,一种“进取的自我”^①开始出现,指年青一代以积极主动的姿态来为自我发展开辟道路,为自我争取更多选择的可能,也愿意为此付出冒险的代价,投身未知的领域。尽管这一“进取的自我”要到一九九〇年代中后期才开始在社会上蔚为大观,但是路遥笔下的高加林、孙少平显然预兆了这种先声。二〇一三年,方方的中篇小说《涂自强的个人悲伤》发表之后,孟繁华先生敏锐地将涂自强接续到高加林所开启的人物谱系中^②。涂自强离开农村,步行进城,读大学、找工作,如仪式般展现了“进取的自我”的奋斗轨迹。

高加林是一个性格复杂的人物,极具多面性,一个饶有意味的问题是:高加林在今天演绎出不同的“分身”,而这些“分身”的际遇却大相径庭,他身上某种性质正渐渐消失,而另一种性质却日益大行其道。

有天晚上,高加林和刘巧珍“第一次亲密接触”,在短暂的意乱情迷之后,高加林马上开始懊悔:“他后悔自己感情太冲动,似乎匆忙地犯了一个错误。他感到这样一来,自己大概就要当农民了。再说,他自己在没有认真考虑的情况下就亲了一个女孩子,对巧珍和自己都是不负责任的。”请注意:高加林后悔的内容有两点,而这两点在他心目中是有先后排序的,他首先意识到巧珍有可能拖累自己,“这样一来,自己大概就要当农民了”,在警醒巧珍是其发展前途上的障碍之后,他再后悔“没有认真考虑的情况下就亲了一个女孩子”,有点儿不负责任。通过这个细节我们可以去触摸高加林的性格:这是一个冷静而理性的人,步步为营,小心筹划,一直在为自己的未来人生做规划,不断提醒、反省自己不要走错。高加林这种冷酷而理性的性格,显然引起争论。也许感受到了舆论压力,路遥在一些场合曾经为自己和高加林(人物身上当然凝结着作家自身的体验)辩

护:“像我这样出身卑微的人,在人生之旅中,如果走错一步或错过一次机会,就可能一钱不值地被黄土埋盖;要么,就可能在瞬息万变的社会浪潮中成为无足轻重的牺牲品。”^③在《人生》中,高加林的“官二代”同学黄亚萍可以错、张克南可以错,唯独高加林是不能错一步,他付不起这个代价,没有办法挽回的。所以当县委机关大院的通讯干事这个机会闪现的时候,当黄亚萍出示着两人未来美好蓝图走进他生活中的时候,高加林是不会拒绝的。所以路遥才会将柳青的话——“人生的道路虽然漫长,但紧要处常常只有几步,……你走错一步,可以影响人生的一个时期,也可以影响一生。”——作为《人生》开篇的题词。这种冷静而理性的规划人生,在必要时舍得放弃先前所有(比如与巧珍的感情)的性格,在此后的青年形象中不绝如缕地出现,比如近年来大红大紫的《致青春》中的陈孝正,他的名言是:“我的人生是一栋只能建造一次的大楼,所以我错不起。”——这恰是高加林的另一个“分身”。这个“分身”还有一个特征:在赤裸裸的“都市丛林”中,往往必须以“暗黑”的方式来确保不被淘汰出局。其实《人生》中已经“预演”过这一幕,大队书记为了安插儿子而将高加林逐出校门,高加林在失望之余立即写出一封求告信要求在部队当副师长的叔叔给他找工作。这是他所选择的反抗方式——在遭到权势的打击之后而乞求更具强力的权势来与之抗衡。完全可以设想,间接借助退伍后位居劳动局长的叔叔,高加林成了县委通讯干事,但他获得这一职位是不是也有可能同时踢掉了另一个“高加林”? 在高加林进取的过程中,不公正的“人

① 孙立平:《我们在开始面对一个断裂的社会》,《战略与管理》2002年第2期。

② 孟繁华《从高加林到涂自强》,《光明日报》2013年9月3日。

③ 转引自程光炜《关于劳动的寓言》,《现代中文学刊》2012年第3期。

情政治”、阴暗的手段没有终结反而不停得到复制,而高加林完全默认、领会,甚至能娴熟操弄这套伎俩为自身利益服务。

前文提及的“十九世纪小说发展历程的伟大传统”之所以成立,是因为在个人和社会之间具有健康的联动感:社会的开放性激发人的能力和抱负,个人裹挟着被激发而出的创造性和能动性生气勃勃地投入生活……然而到了今天,日趋惨烈的现实早已告诉青年人:集体世袭、贫富悬殊、上升通道壅塞、整个社会结构已经闭合,自力更生打拼出一片天地的几率微乎其微。这个时候,高加林的两个“分身”就面对不同的命运:涂自强们依然在积极进取,但是他们终究无法踏上阳光下按部就班、光明正大的“坦途”,涂自强固守着高加林原先残存的道德感,而这也许会成为今天成功道路上的障碍,必须加以突破,于是陈孝正们粉墨登场,算尽机关、该放弃时痛下杀手、甚至不惜动用“超常规手段”,才能完成几乎“无法完成的任务”。

只有陈孝正们才有可能在都市丛林中实现微乎其微的“暗黑逆袭”,而涂自强们则倒在个人与社会之间正常的联动感被撕裂的关口——这是高加林的“分身”在今天的不同际遇。

三、突破“角色化”

近期很多报刊都发文批判当下青年人的“暮气沉沉”,在指出这一客观存在的现象的同时,我们还应去探究“暮气沉沉”背后的社会特征和规训机制。整个现代社会的特征是合理性,强调在一个可以操控的范围内稳妥运行。青年人有意无意地服从这一合理性,同时被剔除掉反抗性与批判性。这其实是一种“角色化”——内化来自外部的期待和规定。有人在感慨当下“寂静的青春”时,往往会缅怀《青春之歌》这样的作品,那似乎是激

进而火红的青春岁月。不过仔细想想,林道静的成长,也不过是按部就班的天路历程。也就是说,从“激进的青春”到“寂静的青春”,其实都是一种“角色化”的书写。

中国的“青年”在梁启超“少年中国”的振臂一呼中诞生。自晚清、新文化运动以来,统治团体、政治社会化的担当者以及知识分子、普罗大众都在不断树立各种各样理想的、模范的青年形象,“少年中国”的国民召唤、“新青年”式的范导想象、“社会主义新人”的打造……青年形象史的生成、延续,伴随着各种政治力量、社会势力对于“青年”所寄予的角色期待和青年自身具备的角色意识(呼应社会期待而扮演相应的角色)。“角色”是社会学的核心概念,其定义是“在社会结构中占有特定地位的人士应有行为的模式或规范”^①,这种“应该成为什么样的人”的期望经常出自同时代的人或社会群体。“新青年”、“五四青年”之所以能够在现代中国获得特殊地位,并成为占据主流的青年角色模型,并不仅仅出于青年自身的反抗精神和行动成就,也并不仅仅出于其集中表达了年轻人对权利、自由(恋爱、婚姻的自由,经济独立,自己筹划生活等)的强烈诉求(这一切诉求只有被纳入“青年”的意义结构之中,才可能在中国社会获得正当性的源泉,而提供这一正当性的文化和思想资源“主要不是来自于年轻人内部,而是来自于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近代思潮中既有的对知识人和青年的角色规定”^②),而恰恰是因为青年们呼应或者说迎合了社会对年轻人的角色期待。我们在此涉及了两个维度内的“青年”:作为现实社会中的年龄群体;被历史地、社会地建构起来的形象。而文学显然是参与这一建构的最重要

① (英)彼得·伯克《历史学与社会理论》,第49页,姚朋等译、刘北成修订,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

② 参见陈映芳《在角色与非角色之间:中国的青年文化》,第56-60页,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2。

的文化式样,在青年文学中,寄托着成年人和社会力量的期待和意义规定,关于“青年是什么”、“青年应该成为什么”的观念意识,点点滴滴内化到了青年内部中去。不妨说,是青年的“角色化”提供了年轻人新的身份,因为这样的理由和身份,“青年”才在现代中国获得存在的正当性,而青年文学、青春主题也在二十世纪以来的文学史上占据特殊地位。

这也就是为什么在中国青春文学的展演中,我们更多看到的是“角色化的生成”,而很少“主体性的成长”。台湾学者黄金麟在身体史学的视野中提出“身体生成”这一概念:“这个概念指称的并不是一种身体的生物性诞生或创造,而是指称一种在肉体既存的情况下所进行的政治、经济、军事、社会或文化模造。这种社会加诸自然条件上,从而产生的身体改变,是身体生成这个概念想要凸示的景况”,这样一种存在于特定历史背景下,“因随着国族命运的更动而被积淀、型塑出来的”生成形式,逐渐变成“一个普遍、共通的身体开发形式”^①。而文学可以作为上述普遍、共通的形式在一特殊领域内的显现,小说中青年形象的塑造也受到政治、经济、思想教育等外力的规约,诚如研究者在讨论现代中国的成长小说时所发现的:“成长主人公摆脱传统伦理与封建秩序的专断统治后获得身体的管理权和属己性,他们离开礼教之家后,身体在社会空间里的漫游、位移过程中,亡国灭种的巨大民族危机、国家危机使他们不得不接受身体工具化和国家化的改造式生成。”^②在小说中的表现则是(这往往也成为我们分析这类成长小说的固定视角):

个人时间依附于巨型、线性的历史时间而存在,身体欲望处于社会理性的调适和监控之下,“象征之父”的权威性介入,成长作为民族国家的寓言……青年是建设国家、推动社会进步的主力军,青春意象与情怀也是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一再书写的主题,但这一表面上风光无限、热力四射的群体和文学形象更多是被外力召唤出来的,这种召唤又着眼于“青年”社会角色的功利性,冯至在建国后写的诗句“你让人人都恢复了青春”^③恰表现出青春文学的悖论:青春固然美丽,却不是本己的属性,而是被种种“大他者”(“你是党,你是毛主席”)所给予、派定的。

只有充分正视青年人的特性、欲求、内在权利、精神自由以及生命原初意义,真正的青春文学才会诞生,真正属于青年人的城市书写才会到来。

二〇一四年五月二十三日

【作者简介】金理,复旦大学文学院副教授。

(责任编辑 韩春燕)

-
- ① 黄金麟《历史、身体、国家——近代中国的身体形成(1895—1937)》,第2-3页,北京,新星出版社,2006。
② 顾广梅《中国现代成长小说研究》,第337-33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
③ 冯至《我的感谢》,原载《光明日报》1952年7月。收入《冯至全集》(2),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